

坚守与跨越 丛书

今日文坛

第一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今日文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文坛. 第1辑 /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
文艺理论家协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3
(坚守与跨越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7929 - 9

I. 今… II. ①贵… ②贵…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49 号

今日文坛第一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责任编辑 / 黄 瑛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7929 - 9/I · 1613

定 价 / 36.00 元

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研究

主 编 / 何光渝

执行副主编 / 倪 明

书 眉 题 字 / 戴明贤

编 稿 / 陈 武

陈亚丹

白 雪

李 晶

目 录

CONTENTS

能否修复的历史记忆

——论我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诸多关联

杜国景 1

何士光小说创作略论

王 刚 14

成长透视——王安忆笔下女性成长研究

李 晶 30

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还原性及其重建使命

——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例

陈 武 66

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诗意追求

祝成明 76

带血的野玫瑰傲然开放

——论长篇小说《苦菜花》的革命叙述建构

潘光芝 93

“规训社会”的权力运作

——重读长篇小说《创业史》

叶有根 101

柔美与阳刚的辩证

——端木蕻良小说中的性别意识审美

刘 菊 107

白话对文言的胜利与平民生存观的确立

——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新解

黄桂娥 120

工具·审美·文化

——对中国近现代雕塑到当代雕塑发展困境的反思

尹宣胜 136

孟光涛:贵州现代山水画的宗师	沈福馨 146
杂技剧《天鹅湖》的艺术价值及历史意义	刘斯奇 155
中国主旋律电影及其叙事的意识形态性	何天洋 175
浅析法国“新浪潮”纪实美学思想对新时期 中国电影的影响	林 华 192
游离于他性历史外的女性视角及新历史主义镜像话语 ——中国第五代导演李少红的影视作品解读	刘智焕 204
消解暴力的艺术 ——徐克武侠电影研究	杨文超 226

能否修复的历史记忆

——论我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诸多关联

杜国景

【摘要】 我国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我们究竟要在其中去发现什么,关注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发现和关注,涉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诸多关联。必须摒弃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方法,以立足现实的历史意识去把握其历史本质,才能揭示其文学想象、农民意识垂范与农村新人塑造、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 历史主义 农民意识 农村新人 乌托邦 乡土伦理

一、不合时宜的“红色经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台和荧屏悄然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或重播、重演的热潮。冷寂多时的李玉和、吴琼花、郭建光、杨子荣、江姐等英雄人物,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就连当年影响不能与其比肩的《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等等,也拥有了新一代的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同样是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红色经典,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却再难起死回生。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的失误,这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说,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压迫、反抗、救亡、战争,给后代留下的是无数

足以言说的传奇和悬念;那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值得诉说的似乎只有李顺大们的辛酸,陈奂生、冯幺爸们的屈辱了。除了沉重的苦难、荒谬的道德、虚幻的爱情,合作化似乎再没给人们留下别的什么。如果借重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来重新演绎梁生宝、刘雨生们的故事,简直不敢想象会是一种怎样的画面。可见大众传播时代的红色经典,其实也充满太多的玄机。农业合作化小说所宣喻的价值观就显然是窘迫和尴尬的,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棘手的,是这类小说的真实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就曾被提出来。^①不久,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价值颠覆进行矫正。^②80年代末,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再度被质疑,而且否定的声音更强大、更偏激、更具理论色彩。^③90年代后,这类小说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史范畴被理性地描述和争议。比如,对合作化小说,现在有从“民间形态”的发现,有从“细节真实”角度的切入等等。^④或者干脆撇开“写什么”、“怎么写”的对应关系,另辟蹊径地以“写得怎样”来谈文学价值的评价体系在重估这类小说时的运用。^⑤但如此一来,又关涉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标准问题。而说到标准,有两种倾向特别引人注意。一是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依照这样的方法,文学评价的标准似乎就是:作品只要在当时取得成功就可以了,只能以当时的成败来论英雄。还有一种倾向则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即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评价作品不能离开这特定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这种倾向的危害更大,在它看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是无法打通的,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文学历史将会变成各自独立的残篇断简,各种价值观将会被拉平或者取消。

如此看来,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它似乎具有某种悲剧性的品格。不能仅仅以作者或同时代人的观点去评价,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对这类文学经典的理解与阐释,既要回到历史,又离不开当前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占有更大的权重。只有从现实出发,并最终回到现实,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当年的历史文本做出评价。总之,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各种价值产生于不同时期批

评的累积过程,并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一过程。因此,研究这类作品,就必须指出它在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时代的价值。它的悲剧性,在于保有某种永久的品质而又不合时宜。它又是历史的,因为它经过了较长的有迹可寻的发展过程。与对这类小说的解构性批评一样,对它们的后价值批评,或者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还原论批评——即把合作化小说看做那个时代政治危机的道德等同物,其实都靠不住。既然它们是各种价值的完整体现,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揭示其中各种价值之间的意义关联。只有这样,才可能解决我们究竟要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关注什么和发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关注和发现的问题;才能既回望历史,又回到现实本身。现在以至将来,当我们要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时,恐怕非包括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内的这些红色经典莫属。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赏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厌恶的态度抨击它,但你无法忽视它,逾越它。只要迫近现实,追溯历史,你就必须与其思想和艺术对话。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合作化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小农经济的土壤,孕育过丰富的乡村合作制度资源,劳动力的变工互助,牲畜、工具或生产资料的交换、互补等等,在中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过于久远的历史不说了,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华洋义赈会在河北香河、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都曾组织乡村合作社试验。国民党统治时期,出于缓解农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需要,也曾推动农村合作社运动。^⑥而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延安时代,就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通过合作社来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借鉴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合作化制度资源和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开始思考如何将亿万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并已初步付诸实践。它的性质,与此前国民党政府推动的合作社运动当然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农业合作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深度模式,是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象的必然结果。当年,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以及大批解放区短篇小说,就已经有对合作化的描写。尽管那时的合作化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涉及所有制改

造,但合作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变化,已经为解放区民主政府和广大农民所瞩目,并当做一个方向来提倡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有制性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肇始于1951年12月。当时,东北、山西农村的两个老解放区,在土改后出现了包括两极分化在内的一些新问题,而中央准备通过合作化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运动从试办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开始,不断加快速度,直至引发了各地农村的种种矛盾,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极大争议。最终,在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的坚持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51年到1952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300多个;到1953年12月即增长为14000多个,两年增长46倍;到1954年秋增加到10万个;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已为65万个;同年春还计划发展到100万个。从1951年到1955年,每年的增长数为20万。^①牵动面如此之广,难怪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要占有突出地位了。它们甚至可以构成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一部编年史。如果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为线索来排列,就可举出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代表作。如《不能走那条路》、《青枝绿叶》、《桥》、《创业史》(第一部)、《浪头与石头》、《三里湾》、《在田野上,前进!》、《山乡巨变》、《冰化雪消》、《夏天》、《风雪之夜》、《私访记》、《爬在旗杆上的人》、《狠透铁》、《“锻炼锻炼”》、《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沙滩上》、《“老坚决”外传》、《赖大嫂》、《卖烟叶》、《风雷》、《艳阳天》等等。农村社会变革的每一个脚印,几乎都可以从小说中找到痕迹。

这是刚刚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是主流意识形态物质性实践所憧憬的乡土未来。今天怎样认识这些想象和憧憬,当然会影响到对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按照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七一”讲话的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夺取了政权;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合作化运动包括在内);三是改革开放。现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并不回避当年在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过程中的诸多失误。这主要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和扩大化,于是,才“形成了这一段曲折而又不失悲壮

的历史”^⑧。对这一段历史,像过去那样美化它,可能走向历史偶像主义,即崇拜历史起点,崇拜历史过程,进而走向历史泡沫;否定它,则可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即看不起自己,全盘照搬西方。大众传播时代,如果借助传媒和影视技术对这一段历史做戏拟化处理,像“大话西游”、“戏说乾隆、康熙”、“水煮三国”那样,效法的又将是历史虚构主义。以上,便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想象的三大难题。而无论美化、否定,还是戏拟,都将是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其中,历史偶像主义教训深刻,是不可修复的历史记忆。历史虚构主义至少在现阶段因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条件,暂时也不会波及包括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内的红色经典。危害最大因而特别值得警惕的,倒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缺少历史意识,被它加以虚无化的,包括历史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历史本质?我们该用怎样的历史意识去触摸和把握它?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等等,当然是历史本质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把握历史本质,还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我赞成复旦大学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历史的本质与当代生活的本质密切相关,“在研究历史之前,先要研究领悟当代生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所蕴含的客观的价值导向——市民社会、民族政治、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基本人权、社会公正等等,正是历史意识首先要加以把握的思想内容”。所以,“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是否有意义的钥匙隐藏在当代的思想意识和客观的价值观念中”^⑨。

我以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就包含着这样的历史本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期间,国家曾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但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实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集体创业,共同富裕。当时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并不大,因而而是以增大城乡差距为代价的。另外,在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中,因为涉及的是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特别加以强化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并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抹煞了区域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过度依赖就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对农业合作化小说创作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是

其文学想象的主要资源,所以,在文本中被定形并获得了特殊形式和结构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幻象,是被文学想象加工过的意识形态经验。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或真实性。即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真”与“伪”,那只是“想象”与现实的接近程度问题。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如何通过对认识主体的规定,进而限制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今天,当我们指出农业合作化小说追求的或许是一种“伪意识”时,那也并不是相对于某种确实存在的“真意识”而言的。^⑩ 虚幻思维也可能是真实思维,尽管它不一定能实现。更何况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奠定的所有制形式直到今天也并没有根本改变。20世纪末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在谈到17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或者在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表现出了更多的冷静和理性。费正清认为,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⑪。莫里斯·迈斯纳则说:“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撼的缺少幻想的时代。”“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⑫ 所以,戈德曼干脆像帕斯卡赌上帝的存在一样,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逻辑:赌博输了你什么都没有失去;如果赢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光明的人生和对这个世界的改变。虽然有点悲观,但不失为一种不甘于随波逐流的抗争。^⑬

三、农民意识与农村新人问题

当今,中国又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

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④。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它固然需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但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绝不应是西方社会的翻版,而是必然会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掘。同时,这种开掘又不可能是向农耕文明或传统价值观念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发掘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触动的传统文化的变异、松动与新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即农民意识的现代化改造是第一位的。

鸦片战争以前,农民意识的一切变化均与儒家伦理道德有关,代表着精英文化大传统对乡村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渗透与吸引。鸦片战争以后,农民意识的变化又多了一种历史动因,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威压,这大体上是一个从保守、敌视到被动迎合与接受的过程。后来,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为农民意识的愚昧和落后痛心疾首,但相对现实的生存危机而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更显得紧迫,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农民意识的现代改造反而显得任重道远。革命胜利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表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自然就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元素:它要让中国农民抛弃世代因袭的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皈依一种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正是这一背景,使得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农村新人”塑造,作为超越历史条件的理想形象被提上了文学的日程。它必须蕴含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并作为正面价值来垂范和提倡,与那些需要加以改造的农民意识具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旨归。他们好比被戴上了一副“人格面具”,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意识形态逻辑。我们可以评价他们虚假、不真实,但绝对不可以否认他们的真诚,这道理跟我们评价某种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这种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是用“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来实现的。

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例。他不仅生活清贫,能够吃苦受累,而且能耐寂寞,不受爱情的困扰。“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是一个经典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他很高贵的品质:节俭、自律,时时能够反省自己,随时能够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生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互助组里的其他人受到牵累。显然,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是梁生宝的人生信条,其目的是要在蛤蟆滩

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目标的高远,不仅使梁生宝能够摆脱爱情的困扰,从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中产生出生活的乐趣,而且能够为自己苦行主义与斗争哲学中找到道德的支撑。不仅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刘雨生,《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韩百仲,《风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作为正面价值的代表,“农村新人”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负有典型示范的使命,不能仅仅从性格真实或性格逻辑去分析。小说赋予他们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只能看做是一种艺术手段,其艺术表现的最终目的,是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秩序。在小说中,这个目的已通过世俗道德的认同与支持得以实现。范灵芝最终选择王玉生,梁三老汉在小说第一部结束时为梁生宝的灯塔农业社骄傲,虚荣心得到高度满足,刘雨生最终获得了爱情等等,就是乡村世俗道德对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的认同,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新人的塑造才没有完全走向虚幻和空泛。

问题在于,苦行主义本质上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根本点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为代价,以压抑自我为特征。以这样的伦理想象做铺垫,来换取理想社会和道德前景的实现,无论如何是个悖论。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行动者的立场,甚至站在个人道德完善的立场,我们理解梁生宝的未来梦想和他的苦行主义价值观与斗争哲学;但他对个人自由和自我的压抑,又让我们觉得苦涩。这是包含着民粹主义特征,又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复杂形象。在这类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其实并没有多少空间,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将自己所熟谙的乡村情趣,嫁接到某种意识形态理念上去,在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而如此一来,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向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皈依就显得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它根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是“私人”与“个人”。“私人”是个古老的概念,它与财产,特别是家庭物质财产紧密相关,因而也与私有制紧密相关。^⑤而“个人”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崭新概念,它总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离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去发现并构建的,就是一种体现着个人权利原则的现代农民意识。这里的“个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

人”，而是体现着人性中的诗意、自我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个人。他在启蒙、救亡、革命、翻身的历史语境中曾长期被误读、被淹没，现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被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文学的乡村叙事除了去发现它、表现它，还应该赋予它新的历史逻辑与合理性、合法性。

四、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悲剧性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国内外流行的理论，重新发掘和阐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本意义，这种方式，或许可概括为“后价值批评”。后价值批评的研究方法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同思路：将小说的故事情节、艺术形象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表征与隐含、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方面大做文章。这是一种规避真实性从而规避政治、拓展讨论空间的很聪明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被解构了的“合作化”的乡土乌托邦，似乎已无须再为它去耗费笔墨。既然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无论作为文学史范畴，还是作为纯粹的文本，都还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那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更何况中国在西方传统之外所提供的另一种乌托邦观念，自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它虽然对理想社会做了热情的憧憬，但并没有完全割断乡土伦理的现实基础。因此，将乡村的“生活故事”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剥离也是有条件的。以《三里湾》、《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为例，合作化在其中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从外部楔入的“事件”，并非乡村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念。中国理想社会的形态不像西方那样，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而是倾向于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其核心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对乡土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互助合作只是小农经济的权宜之计，私有制与私有观念才是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留恋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的生动描写，仍然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熠熠生辉的主要原因。作为政治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主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发生意义关联，从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莫不如此。所以，在《三里湾》、《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尽管是中心事件、重大事件，但毕竟是从外部楔入而并非从内部生长的，大量的乡村日

常生活于是就可以游离于合作化“事件”之外,冲淡、稀释了严肃的乌托邦叙事。这就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的“细节真实”为什么至今仍为人称道,从《李双双小传》中为什么会发现“二人转”结构模式的重要原因。

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毕竟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度模式。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改造,引导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就早已确定不移的方针。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几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带来新的兴奋点,造成一场文学题材、文学主题的“革命”。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⑩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在指向中国革命的这个深度模式时,必然会追求乌托邦精神与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同构。于是,合作化小说的悲剧品格便在这种“革命性”的叙事中延展了。它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就如同维克多·雨果所论述的: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⑪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任何失败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从这个意义说,任何历史都具有悲剧的品格。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幻想、憧憬、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

有趣的是,合作化小说在重建一种伦理想象时,总是在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之间左右摇摆和游移。互助组也好,初级社也好,要让农民自愿参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共同富裕,让农民拥有财富,过上好日子。然而,小说又总是用“财富恐惧”的道德训诫警告想过上好日子的农民。无论是三里湾党支部的领导,还是梁生宝的上级领导,用来警告范登高和梁三老汉不要

走个人发家道路的,都是吕二细鬼或杨大脖子这类人物。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他们又无处不在。因为地主或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土改中刚刚被镇压,被剥夺了财产,因此,这类人物便成了合作化小说用来做“财富恐惧”道德训诫时最好的反面教员,好像共同富裕就必然排斥财富似的。另外,合作化时期的城乡差别,在乌托邦视野中早已大大缩小,至少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与城里的工人、市民是平等的。“乡下”、“乡下人”、“乡巴佬”这类带有城市文化优越感的词语几乎已根绝。于是,马多寿、梁大老汉即便有儿子在城里当着干部、拿着工资,也没能引来“乡下人”多少羡慕。但是,当改霞想进城去当工人的时候,梁生宝又觉得这城市和乡村,还是隔着一层鸿沟的,执意要跳出“农门”的女孩子改霞,和他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与此相关的,是上过学、读过书的农村青年在选择对象时的“文化势利眼”。本来合作化时期的知识青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甚至不如梁生宝这类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农家孩子。偏偏在恋爱的时候,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势利眼”又会跳出来作祟。比如范灵芝疏远马有翼,倾心“爱迪生式”的青年王玉生,又嫌他没上过中学的“文化势利”心理,连夏志清也觉得“应该是个很有趣的题目”^⑧。

可见,农业合作化乌托邦精神所造成的乡土伦理的某种决定性的停顿和间断只是暂时的。表面看来,合作化所建立的制度似乎使中国农民再也不能依赖他们以前所深深依赖的某些制度和习俗了。但实际上,乌托邦精神和理想化的道德前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国的农民所接受的,他们对乡村传统价值的依赖从一开始就使得合作化意义秩序的建立危机四伏,只不过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面前,这种新的意义秩序带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意味,因而传统的习俗和制度便屏住了呼吸而已。冲突早晚是要发生的。这是一场文化冲突。尽管大同社会的理想不完全是舶来品,但大同理想毕竟从来没有融入过中国的乡村社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康有为的《大同书》才不肯轻易示人。^⑨现在,合作化制度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但要让它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自己的思想观念,并从此改变乡村社会运行的惯性轨道,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合作化小说忽略了文化冲突的艰巨性,用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描写这样的转变,其悲剧性也就在所难免了。